



ECONOMY OF TOMORROW

FRIEDRICH  
EBERT  
STIFTUNG

# 未来经济

## 如何进行社会公正、可持续、绿色动态的生产 建设美好社会

Marc Saxer  
2013年5月

- 亚欧两洲的思想家们认识到，为了应对经济、生态和社会挑战，需要建立新的可持续增长模式。
- “未来经济”项目（EoT）汇聚亚欧两洲的经济思想家，共同探讨三大关键问题：
  1. 怎样的经济发展模型才能指引我们渡过经济、生态和社会危机？
  2. 怎样的语篇才能为进步政策提供公平的竞技场？
  3. 怎样的平台能让改革导向的行为体团结起来，形成广泛多元的联合阵线，为新的发展道路进行政治抗争？
- 为了建设能够充分满足所有人需求的美好社会，社会公正、可持续、绿色动态的增长不可或缺。

公平收入和对各种人才的包容驱动社会公正型的增长。

金融行业、自然环境的稳定，以及贸易和赤字的平衡，驱动可持续增长。

原有经济的绿色转型及绿色创新驱动绿色动态的增长。



## ECONOMY OF TOMORROW

### 目录

<b>I 引言</b> .....	<b>1</b>
<b>II 西方和亚洲的现实：不同的起点、趋同的前景</b> .....	<b>1</b>
2.1 西方的大危机.....	1
2.2 新兴亚洲的新挑战.....	7
<b>III 政治经济学的变革：</b>	
改变发展道路需要的不仅仅是事实和数据.....	8
<b>IV 未来经济项目</b> .....	<b>9</b>
<b>V “未来经济”发展模式概览</b> .....	<b>10</b>
5.1 根本原则.....	11
5.2 增长动因.....	13
5.3 国家、私营界和公民界的战略目标.....	14
<b>VI 未来经济话语矩阵：化发展模型为政治沟通工具</b> .....	<b>15</b>
6.1 规范性愿景：“能满足所有人需求的良善社会”.....	17
6.2 增长指南针：“社会公正型、可持续、绿色动态的增长”.....	18
6.3 增长引擎.....	18
<b>VII 展望：动员政治上的变革力量</b> .....	<b>20</b>



## I. 引言

2008年金融市场崩盘后的经济滑坡引发了一系列危机，我们的世界可能因此而改观。全球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失去了工作、住房和储蓄。美国、法国、英国和日本这些战后经济秩序的核心国家的信贷可靠性受到质疑。南欧社会在紧缩政策下窒息。非选举产生的技术官僚执掌着雅典和罗马这两个民主的摇篮。美洲、欧洲和中东动荡不安。唯有亚洲看似吸取了之前危机的经验教训，在经济短暂低颓之后恢复了强劲增长。

对西方造成严重影响的问题远不止于金融危机，它们的根源也比经济困难深远得多。然而，目前开出的许多“疗法”治标不治本。其余疗法则让人想起中世纪的放血，治病不成，反而致死。为了找到治愈痼疾的方法，我们必须首先诊断出目前混乱的本质，然后再挖除病根。

新兴的亚洲国家面临着相似的经济和政治挑战，受到同样的社会和生态制约。亚洲新兴国家的局势也有许多不同于西方之处。因此，本文将从当前西方危机的根源谈起，然后讨论东方面临的挑战。接着，我会指出，普通的研究和政策建议组合无法对抗来自现状维持力量的强势抵制，因为后者的利益在目前政治经济体系中盘根错节。正因为如此，未来经济项目(EoT)建议采用三条腿走路战略，建立一个替代增长模式，通过导引语篇来铺平政治竞技场，打造一个让多元化联合阵线团结起来的政治平台，为新的发展道路进行政治抗争。最后，本文将报告未来经济项目亚欧对话的成果，试图勾画出一个社会公正、可持续、绿色和动态增长模型的轮廓。

## II. 西方和亚洲的现实： 不同的起点，趋同的前景

## 2.1 西方的大危机<sup>1</sup>

在下文中，我将一层层地剥开西方大危机的表象，直到确定它的内核根源。虽然本章的关注焦点是西方，但西方面临的一些挑战可能在世界其它地方也适用。

### 表象：欧元危机

欧洲各国主权债务已经累积到了严重制约政策决策的地步。事实上，目前的欧洲政治除了借新债还旧债，看不出还有什么其它作为。然而，对于危机根源和应对措施的激烈政治争斗危及欧洲一体化。难道不是对银行的救助导致了爱尔兰、西班牙等国的主权债务危机？希腊、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在经济衰退之时急剧压缩公共需求，难道不是自杀行为？为了挽救欧元而强调货币稳定，结果不但延长了主权债务危机，还威胁到了欧元的存续，难道不是这样吗？<sup>2</sup>所谓的“欧元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之前的分析有误，错把主权债务当成危机的起源，而没有将其归咎给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sup>3</sup>事实上，欧洲外围国家深陷困境。在经济繁荣期，廉价的、看似无限供应的信贷破坏了进行结构改革、提高生产率的积极性。经济危机来临时，这些经济体无法通过货币贬值来重新获得竞争力，而他们的主权债务 - 实际上是以外币计价的 - 爆炸式增长。然而，直到现在，欧元这个结构性的欠缺尚未引起重视，因为德国和其它国家没有深化经济和财政一体化的政治意愿。它们非但没有通过发行欧元债券来补救主权债务危机，<sup>4</sup>反而坚持紧缩政策。

对危机的解读和响应提醒我们，政治经济和语篇霸权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sup>5</sup>。只有从有可能失去资产的投资者的视角来看，货币稳定政策才有意义。欧猪四国必须展示，它们宁可破产也不终止偿债、也不威胁欧元这种新的金本位制



的稳定。

在对金融资本主义危机的一般辩论和对金融危机根源的具体辩论中，众说纷纭。即便如此，力图维持现状的联合阵线成功地把持了对危机的主流阐释。他们以前声称，危机的肇首是缺乏规管的市场和系统失败。现在他们转而指责不道德的个人和过度的。

政策响应只是一个结果：在紧缩政策的清洗下，衰败的社会不得不重返美德之路<sup>6</sup>。为了一劳永逸地治愈这种不道德的借债成瘾，对通胀满怀焦虑的柏林、技术官僚主导的布鲁塞尔和新自由主义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了一个药方。正是同样一个药方将世界经济逼进1929年大萧条<sup>7</sup>。减支、放松监管和私有化其实就是把“华盛顿共识”强加给了欧洲外围国家。而“华盛顿共识”在解决以往的世界危机时效果并不好。事实上，这些政策的缺陷正是引发失衡、酝酿危机的原因之一。在美国、英国、法国和南欧，对福利体系的新一轮放血疗法即将开始。

## 第二层皮：赌场资本主义危机<sup>8</sup>

虽然主流拒不承认，但主权债务的根源就是金融危机。事实上，正是对冲基金和投资银行的庞氏骗局将全球经济推下了悬崖。在美国房地产泡沫高潮期，银行和投资者杠杆率高企，经济稍有下滑，股价就一文不值。华尔街的金融奇才们无法正确评估风险，只能做出一些不现实的假设，如利率永远不会上升、房产价格永远不会下跌。等到利率升了、房价跌了，整个赌场瞬间崩塌，整个金融体系心跳骤停。今天，杠杆率过高的银行依然脆弱，所以金融市场对投资组合中的欧元债券资产的稳定性极为焦虑。不过，即便存在再次爆发金融危机的风险，20国集团的首脑们对金融市场进行监管的承诺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未能解决实体经济中投机活动造成的不稳定。因此，对冲基金、债券市场和评级机构的影响力依然不减。美国的银行巩固了市场份额，比以前还

要“大而不能倒”。永久低息似乎催生了新的泡沫，泡沫又有再次挤破的风险——只是，如果再次挤破，救助的空间就荡然无存。这些进展再一次强调，在金融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中，国家和市场行为体之间的力量平衡极为重要。

金融危机绝对不是偶发事件，而是赌场资本主义的必然后果<sup>9</sup>。赌场资本主义的治理和激励结构导致道德风险、鼓励在不透明的情况下冒险。不受监管的影子银行体系使得全球经济体系极度脆弱、极易崩溃<sup>10</sup>。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和新兴市场的低息货币使得杠杆率越来越高<sup>11</sup>。今天，国家、家庭、金融界和企业界的过度杠杆借贷阻碍了经济复苏。

## 第三层皮：股东资本主义危机

本次经济危机的根源不仅仅是个人的贪婪和华尔街的“层层叠”高塔。危机就像一场地震，地震前多年压力就开始积聚<sup>12</sup>。在金融体系之外，“股东价值（投资者的利润）”这一管理信条改变了企业界的游戏规则。企业为了活下去、保持独立性，被迫一个季度接着一个季度地报告收益。股东资本主义不稳定，因为它对短期利得的强调对创新和生产率提高方面的投资有害。股东资本主义的经济信条——供应方经济学——在生态和社会意义上均不可持续，因为这一信条没有考虑到社会和环境的外部成本，而社会和环境是民生福利的基础。

最重要的是，供应方经济学未能产生充足的总需求。假如政府和消费者的收入减少，他们就不能继续消费和投资，经济引擎也就无法继续运转。在股东资本主义中，社会面临的抉择全都不好：它们要么债台高筑以维持支出，要么挤压民众、依赖出口需求。盎格鲁撒克逊人等走上了债务融资支撑消费者支出的道路，成为全球第一个和最后一个买家。这一道路可以产生数年的攫取性增长。可一旦利率上升，它就会内部爆裂，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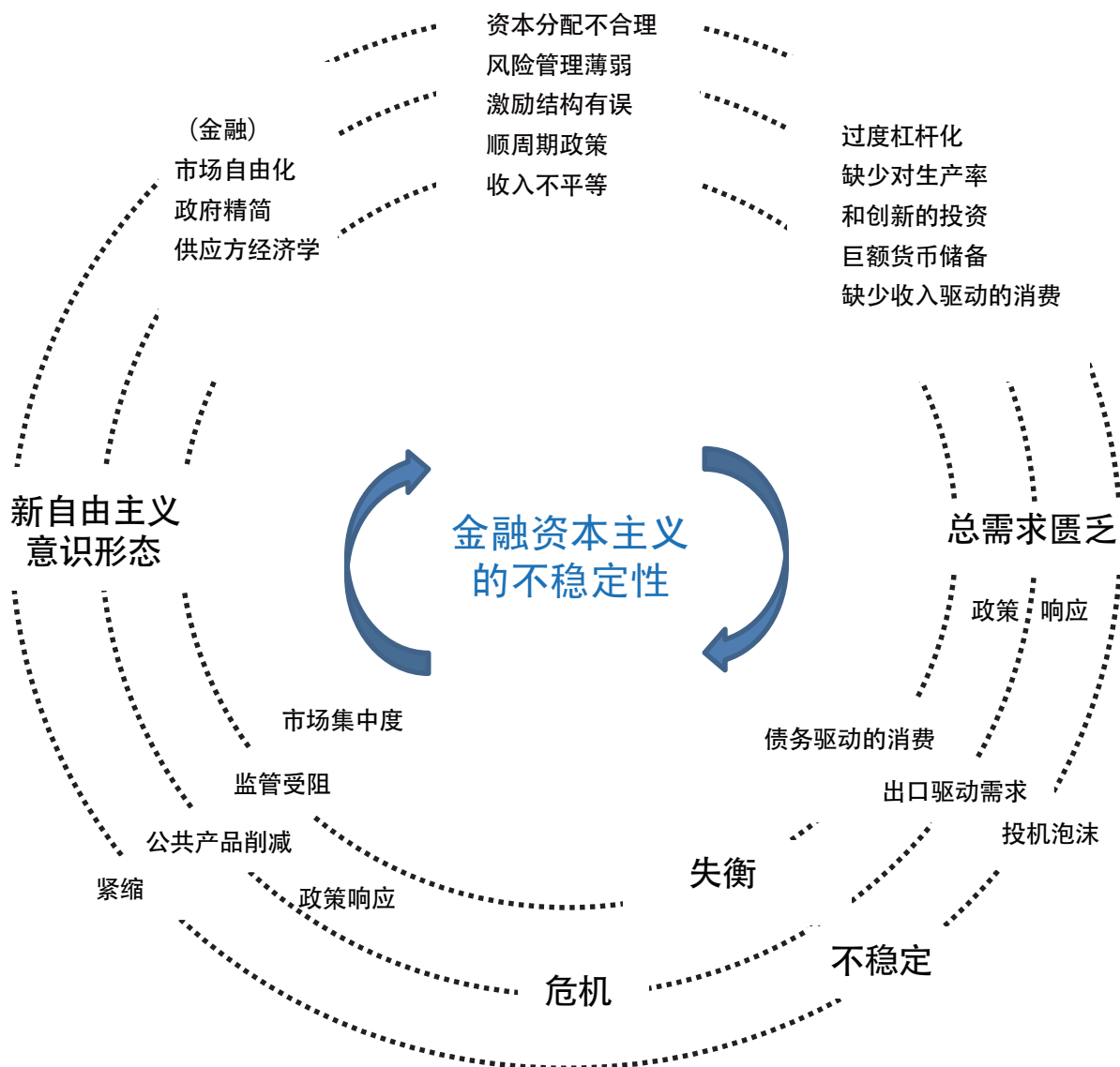
年助燃消费之火的空气供给就会切断。德国等国则依赖出口顺差，其实是依赖国内贬值（低单位劳动成本）<sup>13</sup>。德国等国同亚洲的新兴制造大国一起，成为世界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生产者。这一道路导致国内社会成本高企<sup>14</sup>，而且这些国家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极易受到全球需求下滑的负面影响。总的来说，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顺差和逆差策略造成了重大失衡，而失衡是经济滑坡的核心原因。

换句话说，正是股东资本主义范式最终导致了内部爆裂。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内在不稳定性从1990年后日本经历的一系列危机、1994年墨西哥

危机、1997/8年亚洲和俄罗斯危机、1999年阿根廷危机和2000年网络经济泡沫破裂中可见一斑<sup>15</sup>。繁荣与萧条的周期是低息借款、泡沫和赌场资本主义的后果，也是股东价值资本主义未能产生总需求的后果。所有这些状况都是新自由主义革命形成的<sup>16</sup>。

#### 第四层皮：新自由主义革命的失败

从本质上来看，新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基本教义版。古典自由主义认为自由受到国家强制力量的威胁，所以主张用自由市场“看不见的手”把个人自私的“对幸福的追求”转化为“国





富”。新自由主义则在本质上将自由贬低为消极自由<sup>17</sup>。面对福特主义模式终结后的惰性，新自由主义思想家将自由市场夸大成解决西方石油危机、通胀和大规模罢工带来的经济停滞的万应灵丹。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公共产品、工资和环保在过去仅被视为成本和竞争劣势。国家被他们妖魔化成了扼杀自由企业制度的官僚主义怪兽。他们要求国家不再骚扰辛勤工作的企业家和充满新鲜想法的创新者。

不过，新自由主义其实没有像人们以为的那么支持自由市场、反对高压性的政府。它实际上主张回归到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是资本没有用在生产性目的上。在它看来，资本受困于官僚习气严重的企业和得了硬化症的国企，抑或受到了国家监管的束缚。因此，通过新的管理理念（股东价值）来解放资本、更有效力的所有权结构（私有化）和去除管理习气的繁文缛节（放松监管）将释放创造性破坏，推动经济增长，涓滴效益惠及所有人。

在这种强大叙事的武装下，新自由主义改革家们用落锤破碎机破坏国家监管，抓住任何可以减弱政府力量的机会。同东欧、墨西哥和亚洲展开新劳动力竞争也是他们挥舞的大棒之一：“如果不帮企业减轻负担”，他们辩称，“那么企业要么搬走、要么被接管、要么破产！”其后涌现的放松管制和私有化盛宴象征着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端<sup>18</sup>。

新自由主义革命严重损害了社会和经济。它让一小撮精英从实体经济中夺取越来越多的附加价值，用于大肆消费或投机，事实上在投资者和银行家中间掀起了淘金潮。社会其余成员则深受经济和社会衰退之苦。

## 第五层皮：新古典主义有效市场理论的缺陷

新自由主义市场理念的缺陷深植于新古典主义理论。新古典主义理论建立在一系列根本信念之上：人类是理性的，根据可获得的最完整信息做出决策。市场是处理所有信息效率最高的制度。因此，市场是实现社会资本最优配置的效力最高的机制。

所有上述根本信念都有缺陷<sup>19</sup>。人类，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并不理性，反而受到恐惧、流行风潮、迷信和恐慌的影响。市场行为体并不拥有理想信息，反而倾向于夸张和转向过度，导致了经济繁荣和萧条的循环往复，一会儿创造巨额财富，再过一会儿又抹去巨额财富，从而对整个社会造成了严重破坏。经济学必须同心理学及政治科学融合，才能完全读懂经济周期。<sup>20</sup>

## 第六层皮：攫取式增长的局限性

尽管这些根本理念存在缺陷，但将私营部门从官僚习气中解放出来的确有助于行业进行结构调整，摆脱福特主义体系的危机，获得新生。最重要的是，最近一波国际贸易监管放松潮打开了一扇历史性的机遇之窗，让新兴经济体有机会实现工业化、全面改写全球劳动分工。

然而，一旦这些灵活性效应发挥殆尽，发达市场也好，新兴市场也好，它们的增长本质都是攫取性的（因此，同其它皮层相比，这层皮的挑战更适用于新兴国家）。攫取性增长不可持续，经济、生态、社会和政治局限性将不可避免地让它停下脚步。<sup>21</sup>

## 经济局限性

攫取性增长的动力来自对廉价资源的剥削或透支后代的资源。对股东价值和短期利得的强调



扰乱了资本主义的发动机：产生剩余价值所需的资本积累。不断从企业界攫取资本导致了对长期研发、机器设备和熟练劳动力的投资不足，而这些都是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必要条件。

同样的，对廉价劳动力的剥削引发不可持续的攫取性增长。因为外包压力，工人运动影响力遭到削弱，实际工资减少，进一步降低了总需求，而总需求不足正是金融危机的根源。

## 财政局限性

欧元主权债务危机和次贷危机显示了透支未来策略的毁灭性长期影响。即使这一战略能规避今天的经济衰退，未来的决策者将要么面临极为有限的政策空间，要么决定用通胀来抵消高额债务。各大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也许早就指向了通胀之路。随着通胀对工资收入和中产阶级储蓄的侵蚀，债务危机将转化为社会和政治危机。

## 生态局限性

我们当前的生产、居住和移动模式均建立在有限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之上。这些自然资源包括矿物燃料能源和大气的碳存储能力。随着全球对有限资源的需求的不断上升，资源价格高涨，供应却即将耗尽。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让我们记住了能源供应的脆弱性，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对稀土、水和牲畜的竞争也会导致类似瓶颈。

更危险的是，攫取性生产和消费正在破坏地球的生态系统。自最近一次冰河时代以来，这个由许多脆弱的平衡构成的复杂系统支持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气候变化触发的洪水、干旱、暴风雨和海平面上升将造成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破坏。土壤退化、沙漠化和过度开采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尚未完全显现。

## 社会局限性

在西方社会，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前夕的不平等状况在历史上只有一个先例：1929年经济大萧条。工资未能随通胀而调整 and 消费需求的疲软是不平等状况的即时效应<sup>22</sup>。收入和财富差距造成的社会鸿沟在多数社会都急剧地扩大。生活水平下滑引发了罢工潮和暴乱，撼动了社会基础。从长远来看，社会正义的缺失危及社会和平、削弱社会通过改变劳动分工对变革做出响应的能力<sup>23</sup>。

## 政治局限性

如果人们对社会发展的大方向没有决定权，在生活条件恶化的局面下感到无能为力，那么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就会分崩离析，政治不稳定应运而生。右翼民粹运动利用经济困难和社会正义缺失造成的恐惧、愤怒和憎恨，鼓吹保护主义、民族主义和仇外主义议程。激进左翼运动因为反对紧缩政策和赌场资本主义也获得了一定支持，但对如何应对引发经济危机的生产率和创新危机爱莫能助。攫取性增长的政治局限性推波助澜，将危机扩大到政体（民族国家）和政治体制（民主）层面。

## 第七层皮：民族国家危机

每当危险但又不可理解的动荡在全球爆发时，人们寻求国家和民族的庇护。民粹主义者试图替代新自由主义霸权，再次鼓吹民族叙事，将民族称为“我们的家园、我们的城堡、我们的庇护所”。然而，民族国家过于薄弱，无法控制金融资本主义、减缓气候变化、对抗恐怖主义。因为单个民族国家不再能够挡开危险，更不能改善公民的生活条件，所以它们应该互相团结，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可是，新民族主义运动在竞选中取得的胜利和散漫无章的势力让决策者难以将国



家主权交到超国家层面、建立有效的区域和全球治理。

## 第八层皮：代议民主危机

代议民主危机进一步压缩了政策空间。金融危机暴露了傀儡的操控线。主权债务危机实质上是政治危机：今天的民主领导人无法鼓舞人心，过于软弱而不能提供指引，因此无法号召人们为了建设更美好的明天而暂时做出牺牲。无力动员民众支持的民选领导人极易屈服于既得利益群体的压力。金融市场和跨国企业要求他们减少负债，市民们则要求更美好的生活，民主领导人左支右绌，只能将融资问题推后到未来解决。他们没有别的替代愿景，又没有多少政治腾挪的空间，只好高举“TINA（没有替代方案！）”免战牌。与此同时，对于社会发展大方向的公共辩论退化成了媒体竞技场。换句话说，民选领导人无力领导幻想破灭的选民走上新道路。只好将决策交给非民选产生的技术官僚<sup>24</sup>。然而，坐在各种各样委员会席位上的专家们很容易被说客和权威左右。在危机中，代议民主甚至公开旁落。顽冥不灵的议会受到挟制，非民选产生的技术官僚担任政府首脑，以便执行金融市场强加的不讨喜规定。

代议民主危机之所以发生，不是因为公民们缺乏政治热情，疏于参与。正好相反。在地方层面和社交媒体上，公民们积极发言。不过，他们冷落了代议民主，转向抗议示威、地方孤立主义（“别在我家后院”）和单一议题行动主义。这就说明，民主的制度设置未能根据后工业化社会的需求进行调整。后工业化“个性化”经济与单一、无个性特征的工业化大规模生产不同，它的驱力量日益来自灵活小团队中的个人创造力。在高度差异化的后工业社会里，生活方式、价值观和兴趣千人千面，要求集体行动的企业制度失去了吸引力。虽然目前有各种各样的民主参与新机制的试验，但民主3.0时代还没有到来<sup>25</sup>。

## 洋葱内核：一个形而上的黑洞

政治精英为什么屈服于市场？社会为什么在稍加埋怨后就接受了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残酷？人们为什么不再为美好未来而斗争？

描绘更美好社会的乌托邦愿景未能实现。人们的失望情绪向“人人为自己<sup>26</sup>”的市场激进之路敞开了大门。20世纪的战争和暴行证明，世俗和宗教的乌托邦都是威权主义的富丽秀。新技术带来的不仅仅是祝福。更多财富未必创造更幸福的生活<sup>26</sup>。在所有幻想破灭、希望渺茫、确定性遭到解构之时，宏大的现代化项目和向更美好未来进发的文明进步让位给了极度无奈。西方世界没有什么外部敌人要进行史诗般的对抗，自身的过分行为和愚蠢又敲响了警钟，革命视野消失了。上帝被宣布死亡，共产主义天堂是虚幻，国家衰落不堪，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市场上。亚当·斯密笔下“看不见的手”从来都没有真正失去过神性。正是这种对“从混沌到有序”的进化神秘论的半宗教式的期待把市场变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偶像。信徒们声称，如果政治革命失败，希望就只能寄托在由个人之间自由互动产生的社会进化上。在对市场神秘力量的信念遭到撼动后，人们更清楚地看到了债台高筑、气候变化和全球衰退这些现实。梦想幻灭后，技术官僚走马上任貌似唯一剩下的选择。

然而，如果没有一个形而上的上层建筑，我们无法解决财政、经济、政治和民主危机。如果没有更美好社会的乌托邦许诺，进步这一理念本身就变得毫无意义。如果没有“良善社会”的愿景，人们就不会走到一起，共同建设新社区。如果不是心怀对于美好明天的憧憬，人们不会用抗争来逾越当下的挑战。正因为如此，奥巴马的“是的，我们可以”口号才引起了幻想破灭的民众的共鸣。“无畏的希望”集中力量是解决问题不可或缺的第一步，只有它才能动员人们拥抱变





革。奥巴马的乐观激情消退之后呈现的惨淡现实也一样给了我们很多启迪。在没有大众抵制情况下，急于维持现状的精英们开始重建排他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在新经济模式缺失的情况下，危机管理迷失了方向。在新秩序愿景缺失的情况下，政策制定少了指南针。

## 2.2 新兴亚洲的新挑战

亚洲的成功故事同欧洲危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经过数十年的两位数增长，一大批亚洲民众脱离了贫困，中产阶级迅速壮大。亚洲经济已经深深地融入了全球劳动分工，亚洲四小龙跻身发达国家行列。韩国、中国和印度跨国企业引领技术、主导市场。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越南正在快速地实现工业化。

引入注目的是，造就所有这些成功故事的发展模式同“华盛顿共识”的建议大相径庭<sup>28</sup>。新自由主义式的对自由市场“看不见的手”的迷恋从来都没有独霸过以政府为中心的亚洲国家。台湾、新加坡、香港、韩国和泰国效仿日本模式（政府协调的产业政策、重商主义的出口鼓励与廉价劳动力的结合体，新近被称为“北京共识”），其崛起令人瞠目。稍后，中国和越南也这样发展了。印度尼西亚受益于丰富的、受亚洲繁荣经济追捧的自然资源。私营部门从腐败无能的官僚体系中解放出来，为印度、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一方面，印度等国日益转向投机性投资和金融业放松监管<sup>29</sup>；另一方面，亚洲各国对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深表疑虑<sup>30</sup>。

的确，亚洲从1997/98年危机中学到了深刻的教训。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出了一些不靠谱的建议，但亚洲国家并没有完全放松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尽管马来西亚政府被妖魔化<sup>31</sup>，但如今亚洲政府还是通过资本控制来保护本国经济。正因为如此，华尔街的崩盘没有溢出到新兴市场。出于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不信任，这些国家建立起了

巨额资本储备<sup>32</sup>。一方面，这些储备加剧了全球失衡和全球总需求的疲软，而后两者正是金融危机的诱因<sup>33</sup>。另一方面，有了这些储备，亚洲国家不会像欧美国家那样面临主权债务危机。因为亚洲国家已经深深地融入进了全球劳动分工，对出口需求产生了依赖，所以无法同发生危机的西方“脱钩”，但亚洲经济仍然快速反弹，并且再次强劲增长。

然而，新挑战层出不穷，亚洲的成功道路也日渐走到尽头。多年来，观察家们一直在讨论中国经济“软着陆”和“硬着陆”的概率。近来，越来越多人警告说，中国金融危机迫在眉睫。杠杆率急速攀高、潜在增长下滑、房价飞涨，这些都是日本、欧洲和美国危机爆发的前兆。<sup>34</sup>考虑到亚洲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融合程度，如果中国爆发危机，其它经济体一定会遭到重大打击。

即使亚洲经济体能够避免硬着陆，它们也开始感受到攫取式增长的局限性。数以百万计的工人从生产率较低的农村（含迁移到邻国的打工者）转移进了生产率更高的工业和服务业，驱动了攫取式增长。然而，廉价劳动力的供应是一种有限的资源，终将遭遇人口极限。中国、韩国和泰国已经是老龄化社会。它们周边那些较小的外包密集区面临的问题类同东欧国家<sup>35</sup>。越南、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一直欢迎出口导向型的外国直接投资，现在却发现这样的投资波动性很大，受国际经济不景气的影响，<sup>36</sup>而且它们往往是短期投资，为本国带来的社会利益少得可怜。公款被浪费在为了吸引一有风吹草动就逃离的外国投资而发放的补贴上，结果没有钱进行必要的基础设施和研发方面的长期投资。在泰国和其它东南亚国家，新一轮房地产泡沫正在形成。一旦一个国家的廉价劳动力竞争优势消失，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会搬迁到下一个劳动力更便宜的地方去，攫取式增长将会枯竭。许多社会吞下了不计后果发展工业的苦果。危险的工业化进程严重破坏了环境。社会鸿沟的扩大威胁到稳定，对政治体制施加着重大



压力。暴动和草根抵抗运动在蔓延。

亚洲的经济和政治决策者已经认识到，原有模式不再有能力应对生态、经济和社会危机<sup>37</sup>。亚洲的思想家们已经得出结论，亚洲需要发展新模式，以便让亚洲社会走上可持续经济发展的道路。

然而，替代发展模式究竟应该是怎样的？这一辩论还远未尘埃落定。亚洲的“探路者”对社会民主发展模式感兴趣。尤其是中国，它充分利用了俾斯麦德国发展模式的诸多要素。北京援引中国数个世纪以来的福利传统，早已着手建设社会保障体系。中国政府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而抛出的天量刺激计划揭示了中国决策者的凯恩斯主义本能。最近，中国政府又调整了工资政策，希望用拉动内需来对抗出口需求的疲软。日本、韩国和台湾也采取产业政策敦促本国产业沿着价值链向上迁移，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高科技产业进发。其它国家也有意效仿。韩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越南（有时稍显胆气不足）开始认识到绿色增长的潜力<sup>38</sup>。中国的生态产业政策看似更为成熟<sup>39</sup>。总体来说，进步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开始改变亚洲的劳动力分工。

另一方面，亚洲观察家们对欧元区危机抱有戒心。他们中的许多人同意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认为欧洲人寅吃卯粮。因此，他们不考虑在亚洲建立欧洲式的福利体系。有关社保的辩论也说明，亚洲的政策制定者们有别于欧洲同行。欧洲人把社会保障看作社会权利，而亚洲人（印尼最近的作为是个引人注目的例外）看重社会保障对经济绩效的提升（例如：人力资本的生产率会更高、国内消费需求、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或对政治稳定的支持（例如：社会凝聚力更强，不会出现动荡）。

### III. 政治经济学的变革： 改变发展道路需要的不仅仅是事实 和数据

世界各地的分析人士对大危机的诸多维度了解得越来越深，对短期危机管理和长期系统替代方案的辩论也如火如荼。

不过，美欧对危机的响应表明，那里的政治和商业精英继续坚守已被揭示出缺陷的模型，他们为危机开出的药方恰恰就是此次危机的罪魁祸首。救助政策带来的有悖常理的后果是，“太大而不能倒”的金融行为体的力量大涨。人们越来越怀疑，他们选举产生的代表能不畏私营市场行为体的既得利益、促进公益吗？在亚洲，建立全球气候治理体制和实施国际劳动标准的努力受到了抵制，原因无他：对在割喉式的国际竞争中落败的恐惧。简言之，精英们虽然日渐认识到现有经济体系的缺陷，却拒绝改变政策。

要解开这个谜团，我们必须将视线转向政治经济。商业、政治和学术精英们都是现状的主要得益者。现有体制不但给了他们地位，还继续给他们甜头。新自由主义继续主导西方语篇，增进了现状的稳定性。虽然继金融危机之后的各种批判性辩论可能让人们更多地看清现有秩序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希望探讨替代方案，但新自由主义叙事仍有着强大的语篇权。只要某个政策是“错误的一方”提出的，依然可以否定。只要某个论点同主流信念相矛盾，就必须靠边站。进步立场遭到取笑，因为它们力图拓展“能说的和能做的”意识形态边界。在现有范式霸权下社会化的许多人依然相信现有范式的有效性，甚至无法想象替代模式。简言之：各个板块的政策制定者均未采取果断行动这一事实不是偶然的。恰恰相反，一个强大的联盟正在奋力维持现状、激烈反抗任何改变现有结构的企图。

鉴于力量和意识形态影响力的不对称，也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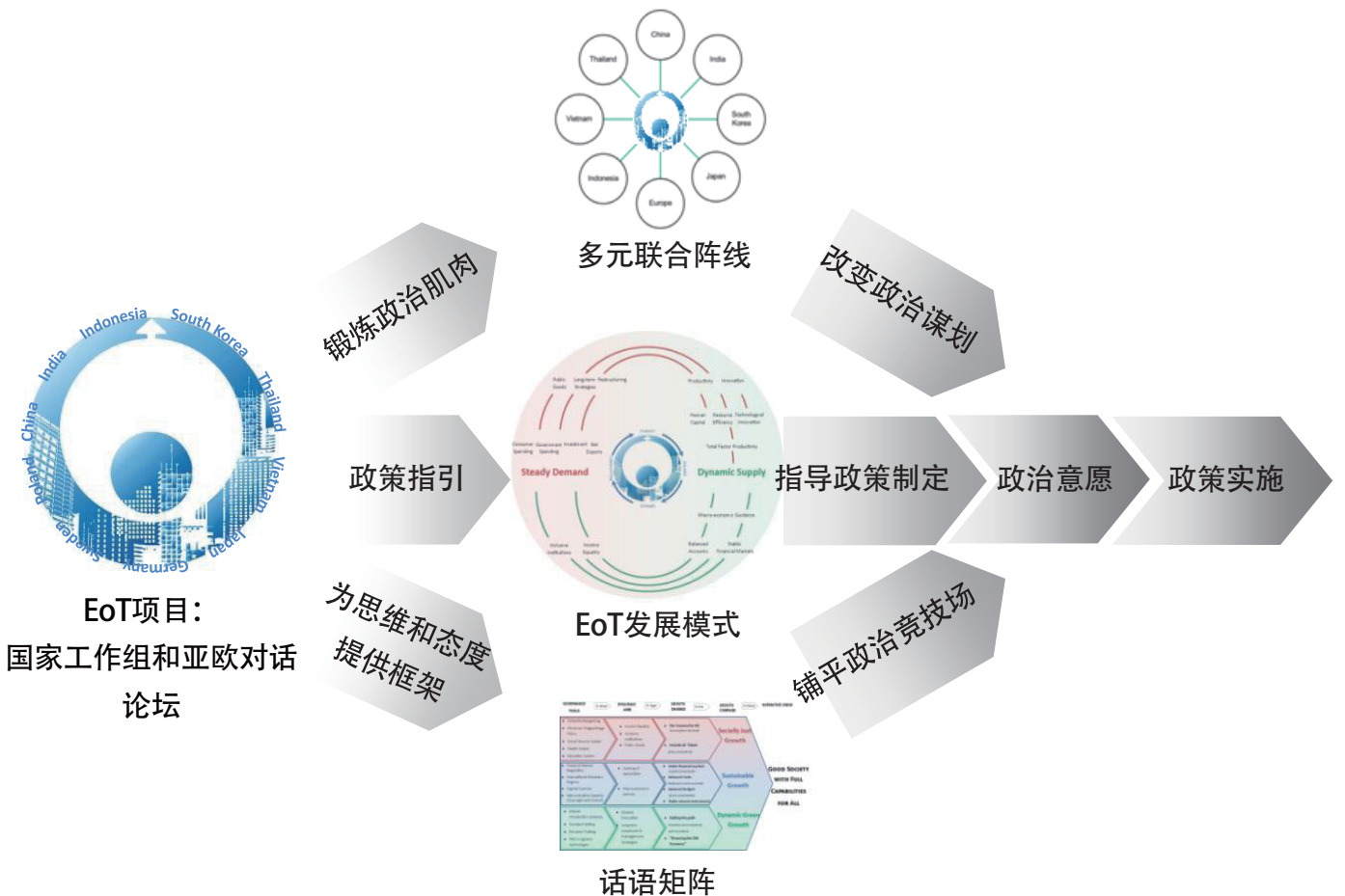
于对手具有更多资源和胁迫力，西方的进步行为体根本无法挑战现状维持派。这一点毫不令人吃惊。亚洲的进步政党、工会和公民社会更为薄弱。在印度尼西亚以外的亚洲各地，进步行为体几乎无力鼓吹它们的委托人的利益，更不用说推动根本性的结构变革了。这直接影响到政策的实施。因为主流拒绝正视危机的根源，不鼓励新思路，对替代行动路径持否定态度，于是进步政策倡议一次又一次地未能落地实施。

总之，在克服特大危机的过程中，我们面临三重挑战：设计一个能够应对经济、生态、政治和社会挑战的发展模式；发展一个令人叹服的叙事，为上述模式所需的政策的实施铺平政治竞技场；锻炼政治肌肉，在同维持现状联合阵线进行政治斗争时赢得胜利。

### IV.未来经济项目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FES）发起了“未来经济”（EoT）项目。该项目的目标是识别出一条替代发展路径，并形成语篇联合阵线，为该路径的实施作斗争。基金会在中国、印度、印尼、韩国、泰国和越南举办工作坊，探讨各国发展模式，寻求下列三大关键问题的答案：

1. 怎样的经济发展模式才能指引我们克服经济、生态和社会危机？
2. 怎样的语篇才能为进步政策铺平政治竞技场？
3. 改革导向的行为体可以在什么样的平台上合作，形成广泛多元的联合阵线，为新的发展路径作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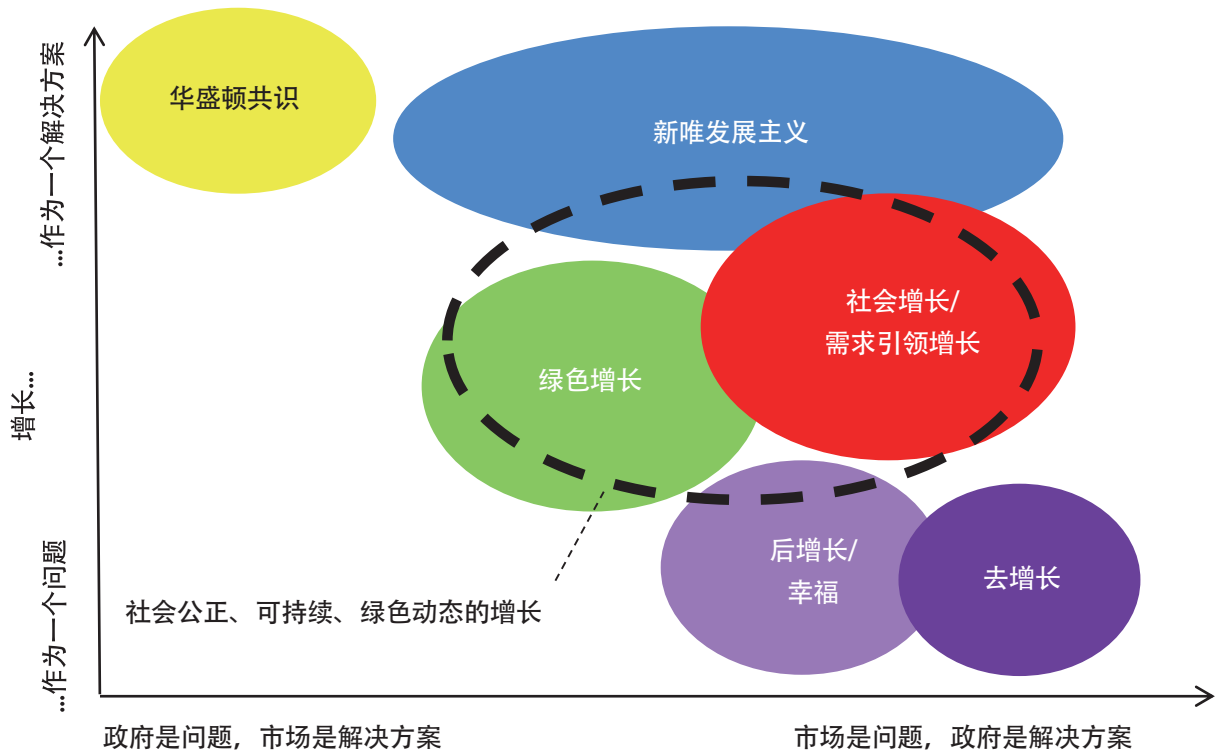
### 治斗争?

所有讨论的出发点是：没有哪一个蓝图能解决各种各样的经济、生态和社会危机。每个社会都需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发展模式。话虽这么说，但亚洲、德国、瑞典和波兰的思想家和决策者还是走到一起，交流分析成果、想法和实施改革的初体验。“亚-欧未来经济论坛”系列相继在曼谷（“体面资本主义”<sup>40</sup>）、新加坡（“绿色工作”）、首尔（“需求驱动型增长”）、德里（“绿色增长”）及又一次在曼谷（“稳定平衡的增长”）召开，来自多元国家的代表不约而同地识别出了一些共同的挑战，颇让人吃惊。虽然来自亚欧各国的经济思想家之间存在不同意见，但他们都同意“首尔、德里和曼谷 I、II”共识，愿意为“未来经济”发展模式勾勒轮廓。

### V “未来经济” 发展模式概览

EoT模式需要描绘出一个能够应对上文述及的宏观经济、生态、社会和政治危机的良性经济循环。挑战是巨大的。为了减缓气候变化和矿物燃料枯竭触发的迫在眉睫的灾难，我们必须全面改造所有经济体的生产、消费、流动和住房。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全盘改造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为了弥合股东资本主义造成的社会鸿沟，必须对政治经济体进行全面改造，这样才能将所有人都包容到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中。为了增强实体经济对繁荣和萧条周期的免疫力，金融资本主义的心室必须加以改造，巨大的全球和国内失衡必须得到有序解决。

我们毫不诧异地看到，许多思想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应对挑战的方法。为了建立语篇联盟，我们有必要知晓这些现存的模型。我们的目标不





是打造一个独一无二的模型，恰恰相反，我们的模型应当尽可能同已有模型相互兼容。模型之间互通的桥梁有时可以通过语篇的阐述来搭建（我将在下一章提出一个向各方开放的语篇矩阵）。首先，我们应当强调学术正值和实证效度。

## 5.1. 根本原则

EoT发展模式由一组根本原则来界定。这些原则让它明显不同于其它模型。经济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能满足所有人的良善社会”创造条件。为了创造这些条件，EoT发展模式提倡稳定需求和动态供应之间的均衡。它的核心规范性目标 – 包容和可持续性 – 也同时是驱动质的增长的引擎。

### 增长？要的，但必须是质的增长

目前世界上有这样一个争议：经济增长可以是、应当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吗？批评者们认为，在最根本的层面上，有限的世界不可能无限增长。因此，有的人呼吁“增长的终结”，其他人则想用更全面、更人性化的目标取代对GDP增长的痴迷。而在另一个极端，许多人害怕在经济阵痛、疲弱增长、环境灾难、社会动荡加剧、甚至更严重的金融危机中度过“失去的十年”<sup>41</sup>。因此，为了对抗全球总需求匮乏造成的负面影响，许多亚洲国家开始用国内需求来抵消出口需求的疲软。为了应对人口增长、快速城镇化和减贫，新兴和发展中国家计划每年投资两万亿美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sup>42</sup>。这些考量同呼吁“增长终结”的观点针锋相对。毫无疑问，为了应对社会和政治挑战，亚洲新兴国家需要增长。

然而，也有这么一个共识，那就是对GDP增长的痴迷导致了生态和社会扭曲，应当用一个质的增长的范式来替代它。如果用GDP或更全面的基准来衡量，增长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应对挑战、创造更美好社会的手段。经济的根本功能是

为能满足所有人的良善社会创造条件。

### 一个由智慧政府指导的社会市场经济

新自由主义模式否定自身的政治经济，声称经济发展源于个体市场行为体之间的随机互动。不管“自由市场驱动的创新”是不是一个迷思，它都没能实现向可持续能源、生产、住房和流动的转型。过去30年的经验表明，不加束缚的市场非但不能克服生态、经济和社会挑战，反而构成了挑战的一部分。

EoT拒绝盲目相信“市场的魔力”，鼓励更广泛的有关发展方向的社会讨论。为了实现这一点，市场和民主政府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新平衡<sup>43</sup>。为了打破债务和贬值的恶性循环，政府应当设定路径，重建经济、包容性分配和就业的结构。然而，在意识形态上不受信任、在财政上跛足的政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政策指引功能。为了建立一条可持续的发展路径，政府需要重拾信心，重获政策空间。我们不必在“大”政府还是“小”政府之间抉择，而是要想办法建设一个有能力防范风险、纠正偏差和给出政策指引的“聪明政府”。

然而，经济全球化让各国政府应接不暇。知识、融资和技术的流动支撑了信息国家的可持续增长。为此，全球经济应当保持开放，坚持规则导向<sup>44</sup>。与此同时，国家合作及全球治理应当加强。

### 稳定和平衡

全球失衡和金融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性为经济危机的爆发创造了条件。长期可持续增长需要一个稳定平衡的基础。为了确保没有阶段性扭曲和退步的稳定增长，必须规避金融资本主义的繁荣和萧条周期。因此，为应对来自全球化金融市场



的不稳定威胁做好准备至关重要。我们还需要解决基本面上的贸易和金融失衡，这样才能取得新的全球均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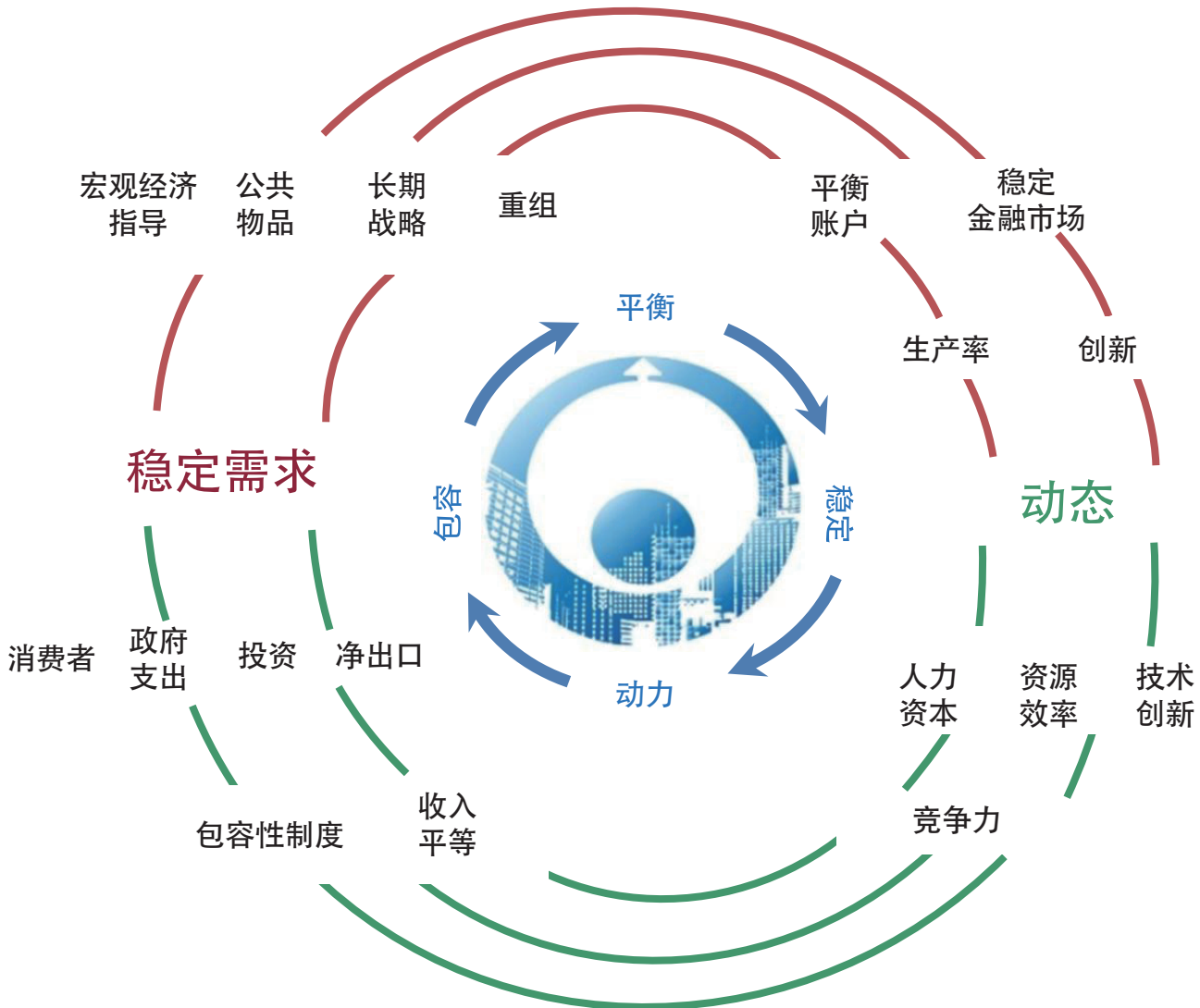
最后，如果生态和社会环境不稳定，经济增长就持续不了。保存生活资料和缓冲快速社会经济转变带来的影响不但是规范性政策目标，而且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框架性条件。

我们必须在对公共投资、消费和财政可持续性的需求之间做出权衡。即便主权债务、通胀和增长之间的关系不像紧缩政策倡导者错误宣称的那样直接，<sup>45</sup>我们还是必须严肃看待该关系对财政稳定和政策空间的长期影响。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平衡好对结构性平衡预算的需求和对短期反周期响应措施的需求。财政可持续性常常被当

作取消多数人意愿的合法性、放弃提供高质量公共产品的借口。财政可持续性的确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不能被滥用，不能破坏民选政府设定发展路径的任务。

### 稳定需求，动态供应

在股东价值范式下，市场痴迷于短期利得，未能对生产率提高和创新进行投资。短期导向成了风靡一时的企业战略，投资者和银行家们得到授权，攫取企业界的资本用于投机。少了债务驱动式消费和“层层叠杠杆”这样的“兴奋剂”，市场基本面没有生成足够的总需求。收入不平等和政府减支不但破坏着社会结构，还因为消费及投资不足而阻塞了经济增长<sup>46</sup>。过去，为了创造总需求，会采用推高出口顺差或鼓励主权





和消费者借债的战略，但这些战略造成了国内和国际失衡，最终引发金融危机。全球储备体系的缺陷，加上对华盛顿共识主导的国际金融制度的不信任，导致新兴国家积累了巨量储备，进一步削弱了全球总需求<sup>47</sup>。

新的增长路径需要平衡动态供应和稳定需求。为了从全球和国内失衡中恢复过来，我们要用收入驱动的需求作为燃料，让增长的发动机继续运转。更平等的收入分配将不但能够帮助受到快速经济和社会变革震荡的社会稳定下来，还能刺激那些最有可能消费的人多消费。为了释放出“创造性破坏”的“供应方”动力，创新和生产率必须得到持续的加强<sup>48</sup>。不过，创新和生产率的提高不能来自对有限资源的攫取，而应当来自对社会人才的包容性运用。

## 包容性创造动力

在新自由主义模式中，经济动力来自不平等和竞争的激励（“贪婪是好事”）。该模式认为，自由市场驱动创新和生产率，而对资源的竞争会提高效率。

然而，三十年过去了，供应方经济学创造的生产率提升并不太多。与此同时，“股东价值资本主义”把社会鸿沟扩大到了只有在大萧条前夜才有过的严重程度。

EoT模型与之相反，它的活力增长是由包容性来驱动的。因为满足了所有人的需要，所以社会能够充分发挥所有公民的创新和生产率潜力。所有人应当能够全面参与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如果公民因为他们的种族、性别或宗教而不能充分参与或遭遇歧视，那么政府有责任积极地扫除这些障碍。所有公民应能享受教育、医疗和信贷服务。他们必须能够自行创业，或者用其它方式充分发挥能力。市场必须收益于人民，而不是反过来。

## 5.2. 增长动因

每一个经济模型都寄希望于一系列自信能够驱动增长的机制。在EoT模型里，“增长动因”揭示了这些假设。

### 收入驱动型需求

收入平等不但促进创新和生产率提升<sup>49</sup>，还能通过凯恩斯乘数效应刺激消费需求和投资<sup>50</sup>。为了抵消总需求的疲软，国内低收入者的消费需求应当加强。进步的工资政策应当确保把生产率提升转化为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消费。与此同时，工资随通胀调整会降低通胀压力，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

### 人力资本

更好的包容性激发创新，因为它能充分利用社会上的所有人才。如果能发挥创新天才、创意、创业精神和所有人的生产积极性，就能充分释放社会的包容性增长潜力。政府和私营部门都有责任放权给人民，让他们充分发挥才能。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不但能强化消费需求，还能通过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和健康来提高生产率。一个提供完整社会保障体系的社会有能力设立好的激励机制，这远远优越于发一点东西或给一些补贴<sup>51</sup>。提供社会保障能降低过度储蓄、以备不时之需的诉求，刺激总需求增长<sup>52</sup>。经验证明，社会保障能为经济危机造成的社会影响提供缓冲，为必要的重组节省时间，同时不会破坏劳动力的素质。

### 资本配置

为生产率提高和创新配置资本对可持续的、动态增长来说至关重要。实体经济需要一个坚实的金融基础来支持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第三次



工业革命)、研发、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市场的发展。全球化的金融行业出现系统失败,没有扮演好配置资本和管理风险的角色<sup>53</sup>。

因此,银行业应当再次转变,为企业界提供服务<sup>54</sup>。为了降低金融资本主义的内在不稳定性,来自金融行业的风险必须控制到最低水平<sup>55</sup>。

## 生产率和创新

生产率和创新推动动态增长。为此,我们需要在基础设施、机器设备、组织、人力资本、研发和资源效率方面进行重大投资。然而,在欧洲、美国和日本去杠杆化、恢复财政平衡、建立一个长期增长的新基础需要时间。为此,做规划是必须摆脱傲慢情绪,政府的政策应当指引“沿产业链上移”的旅程。产业政策<sup>56</sup>可以创造良好的激励结构,鼓励生产率和创新方面的投资。

根据“生态产业政策”<sup>57</sup>进行战略投资可以起到引领作用,同时还能拉动总需求。绿色创新将是后碳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通过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提供绿色工作,为绿色产品找到新市场,经由分布式能源网络和可再生能源保障能源安全,这些都有可能释放出“第三次工业革命”<sup>58</sup>的动能。

## 资源效率

更高的资源效率可以削减成本,推高全要素生产率,加强行业板块的竞争力。与此同时,正值亚洲各国日渐体会到气候变化同自然灾害之间的关系之时,资源效率提高能让自然环境更为稳定。

## 5.3.国家、私营界和公民界的战略目标

为了让这些增长引擎发动起来,私营部门、

政府和公民社会应当携起手来,创造必要的框架条件。决策时需要抓住主次序,聚焦于下列战略挑战。

## 社会公正型的增长

1. 在全球低增长环境下,新兴经济体应当减少对来自工业化国家的需求的依赖,强化国内增长动因。<sup>59</sup>为了抵消总需求的疲软,应当用更平等的收入分配,尤其是通过进步的工资政策,来拉动消费需求<sup>60</sup>。工业化经济体增长前景惨淡,失业率高居不下,所以政府应当通过再分配政策来缓解社会紧张情绪。

2. 包容性的经济体制应当赋予所有人参与经济生活的权利。为了动员所有人才,平等的市场准入和体面的工作机会至关重要。

3. 政府应当提供聪明的公共产品,如教育和医疗保健,以便提高劳动生产率。例如,聪明的失业援助计划在经济突然萧条时能支持(短时间内)就业,留住熟练劳动力、鼓励再就业培训,这样就能将生产率保持在高位。

## 可持续增长

4. 为了让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复苏过来,所有部门(政府、家庭、金融界和企业界)都应当去杠杆化<sup>61</sup>。

为了对冲来自全球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和外部冲击,宏观-谨慎的监管框架必须到位。应当禁止短期投机和影子银行体系,或者至少对它们进行严格监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们应当(重新)建设监管框架和对金融行业进行有效控制的能力。

5. 在国际和国家层面上,需要推出限制投资者快速撤资跑路的政策,因为这会引发破产风





险，甚至导致整个经济体的垮台。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货币治理体系应当制定规则，约束商务和金融流动。改革全球储备体系是有控制地解决全球失衡的必要措施。美元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角色应当重新评估<sup>62</sup>。

必须展开全球合作、推行有效治理，这样才能协调好再平衡工作、规避保护主义零和博弈。缓解必须持有大量货币储备的（感知）焦虑能刺激全球总需求。应当制定出全球统一的核心市场调控政策，如破产规定、竞争政策和金融监控<sup>63</sup>。

然而，存在缺陷的经济理论和华盛顿共识下的政策仍然存在于国际制度的DNA中，如双边（自由贸易和投资）协议。这样一来，政府有效管理风险、对危机作出及时反映的能力就会大打折扣。全球治理需要改革，否则就会被新兴大国建立的制度挤到一边<sup>64</sup>。

6. 为了把国际贸易不平衡造成的不稳定控制在最低水平，宏观经济政策应当努力平衡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出口需求在新兴经济体的转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但如果能有更强劲的国内需求，那么外部冲击的影响就能得到缓解。更进一步的贸易自由化应当抑制住采用休克疗法的冲动，而是循序渐进，同时采取措施对困难产业的劳动力进行再培训。

7. 为了重获政策空间、避免主权债务危机，财政可持续性是个关键。平衡公共投资和消费两方面的需求，也即一方面要有反周期的危机响应，另一方面要有财政可稳定性，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政府还是得试上一试，扩大税基（包括关闭避税天堂），推出渐进式税制，避免债台高筑，尤其要避免借过多外债。除了危机响应，还应当重新配置政府开支，强化政府开支的反周期特性。

## 绿色动态增长

8. 为了节约生产资料，我们要积极推动生产、住房、移动同能源及资源使用这两者的脱钩。政府应当设立激励机制，制定标准，以便加快经济的低碳转型。

9. 如果市场未能遵循长期战略，那么政府就应当引导投资进入创新和生产率提高领域<sup>65</sup>。对基础设施、资质培训和研发的公共投资可以填补空白，提高生产率和创新水平<sup>66</sup>。私营部门应当探索可再生能源、绿色产品和服务这三种市场。生态产业政策可以起到桥梁作用，把绿色技术引入市场，直到后者建立起足够的规模优势和竞争力<sup>67</sup>。如果聪明地把全盘定价机制、法规和有的放矢的投资结合起来，就能指导研发，向投资者和市场释放信号。

## 总结

综合上述讨论，一个替代发展模式逐渐浮出水面。在EoT项目的下一个阶段，国家层面的工作小组需要重新界定这些想法，根据本地情况做出相应的调适。

## VI 未来经济语篇矩阵：化发展模型为政治沟通工具

EoT发展模式所建议的政策能否实施，不仅取决于它们的学术价值。为了战胜维持现状的联合阵线，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多元化的联合阵线，将所有力量积聚在同一个平台上。为了铺平政治竞技场，这个多元化的联合阵线应当提倡富有建议性的、强有力的语篇。因此，EoT发展模式这个技术模型应当被转化为政治沟通的工具。

-EoT语篇矩阵试着朝这个方向迈出第一步。它把



海量的知识化繁为简地组织成了三个维度，也即社会公正、可持续、绿色有活力的增长。只要沿着这些沟通轴线走四步，原先只有专家才弄得懂的政策工具就同一个规范性的愿景衔接了起来，而且还能引起门外汉的情感共鸣。反过来，规范性的愿景为政府和私营部门领导指明了方向，增强了政策的连贯一致性。这个语篇矩阵建议了一些论证路径。围绕它们构造叙事会比较容易：

-规范式的愿景出能让参与政治辩论的一般大众识别社会发展的大方向。

-增长指南针是政府、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政策制定者的指引工具，让后者创造与规范性愿景相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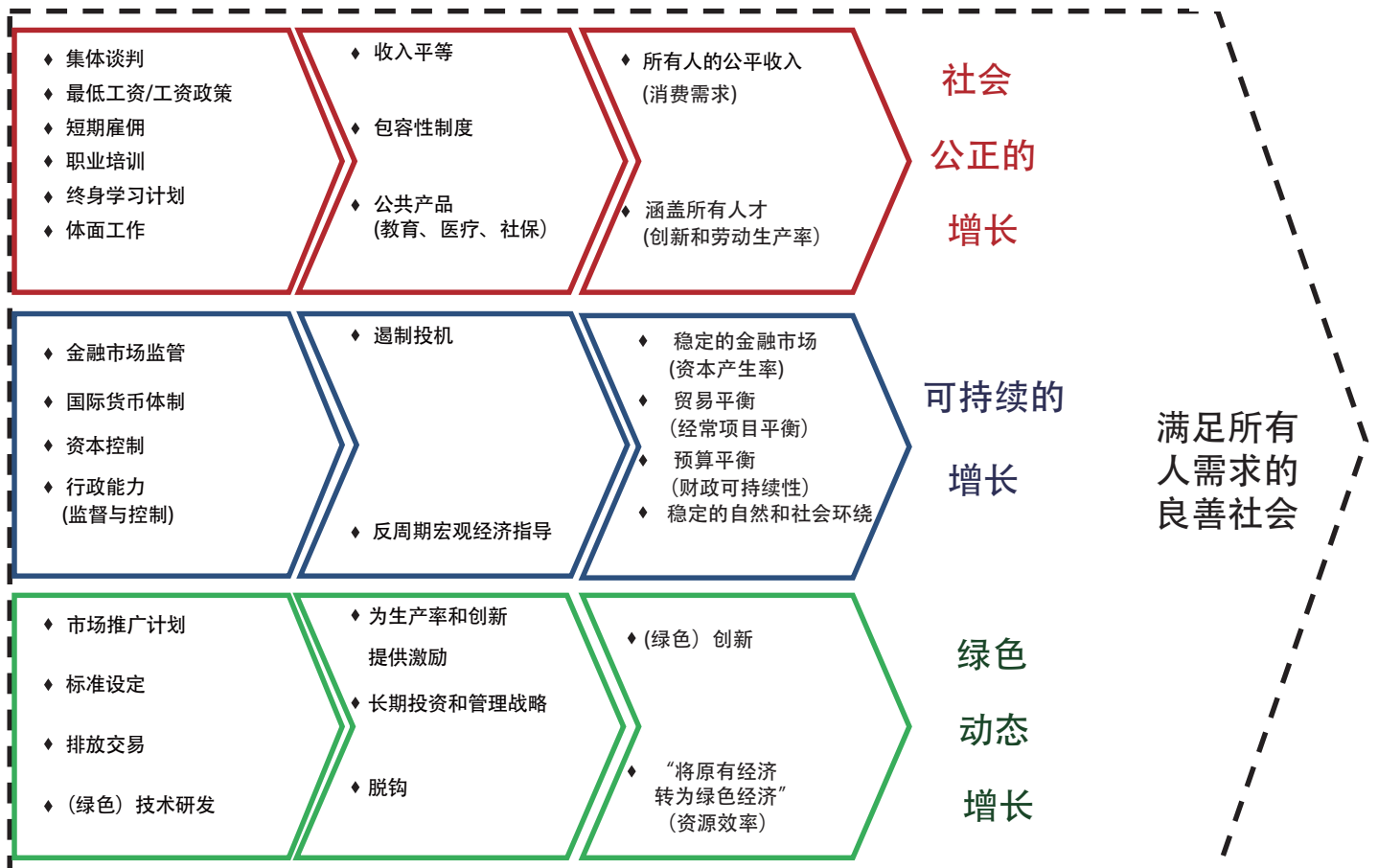
配的增长。与此同时，它把经济放进由生态、社会和政治挑战组成的大背景下。

-增长引擎揭示了有关经济动因的假设。成长引擎是EoT叙事的焦点，把技术专家制定的决策同更美好社会的愿景联系起来。

-战略目标为所有部门的政策制定者指出首要关注事项。

-最后，治理工具向政策制定者推荐具体工具。因为各地的实际情况不尽相同，所以应当举办国家层面的研讨会，邀请不同利益相关者与会，定制最适合当地情况的治理工具组合。亚欧EoT对话是

治理工具      为了实现      战略目标      为了启动      增长引擎      为了驱动      增长指南针      为了      规范性愿景





治理工具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的交换所，但不向国家政策提供蓝图。

这个语篇矩阵能指导企业开发新产品、指导投资者和消费者做知情决策、指导政党制定政策纲领平台、指导研究人员选定课题、指导政府部委、官僚、公民社会和媒体进行政策规划、实施、控制和审查。因此，长期愿景（“我们想要在怎样的社会生活？”）和政策指南针（“我们如何建成那样的社会？”）十分重要。语篇矩阵提供了评判标准和基准（“我们的方向正确吗？”），供公众进行有意义的辩论。语篇矩阵把政策放在全局里讨论，可以更好地审视政策的优缺点（例如：“哪条路径是由这些诱因推动的？”）。换句话说，EoT语篇矩阵向各个碎片化的社会板块释放信号，力图将所有行为体团结在一个共同目标周围，从而增进了多元社会对正确发展道路的辩论。

不过，虽然减少复杂性是必要的第一步，但还不足以打败语篇霸权。我们应当把技术专家的行话转化成简单、朴实的厨房餐桌用语。新自由主义的语篇是由无数言辞魔术师们编织出来的，它成功地用充满暗示的强大叙事表达了主要信息。“涓流效应”和“不受政府纠缠”是“看不见的手”和“动物精神”的现代版本。“让市场来解决”和“把企业从繁文缛节中解放出来”业已指导了一代政策制定者。然而，这些看似简单的叙事决不只是口号。它们牢牢扎根于新自由主义世界观和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研究这些叙事是怎么形成的非常重要，因为正是它们把新自由主义语篇推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

亚洲，新自由主义影响力很大，但从来没有形成霸权。这里没有所谓的“亚洲意识形态”，因为不同亚洲社会的主流语篇大相径庭。不过，每个社会的现状一样受到某些思想、信念和态度的霸权的强化。它们深植于当地文化，从古老神话、集体认同和民族创伤那里获得正统地位。在

亚洲，就像在别的地方一样，为了转换发展路径，这些语篇霸权必须被打破，并且由新的叙事来取代。

接下来，我会把技术色彩强烈的EoT发展模式转换成可用于政治沟通的矩阵。我把该模型的不同要素沿着规范性愿景、增长动因、战略目标和治理工具组成的语篇轴排列，试图探讨有没有可能把它们同现有理论和潜在盟友联系起来。为了建立语篇联盟，对EoT变量的阐述必须激发联想和搭建桥梁。EoT亚欧对话的参与者们充分理解，他们对下述术语的支持认可只是EoT项目下一阶段的起点。下一阶段的任务是重新评估并进一步发展叙事。我希望，通过解释所选择的术语背后的逻辑，能够鼓励更多有关如何构建更强大的语篇的战略辩论。

## 6.1 规范性愿景：“能满足所有人需求的良善社会”

在自由和平等之间取得平衡是自柏拉图以来民主社会面临的主要挑战<sup>68</sup>。当代思想家以赛亚·伯林呼吁将赋权纳入正向自由，约翰·罗尔斯提倡把促进社会中处于最劣势地位的人的平等作为正义的支柱<sup>69</sup>。阿玛提亚·森认为，自由与平等的结合是政府、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的使命，应当积极主动地扫除阻止个体充分发挥潜能的障碍，创造一个“能满足所有人需求的社会”<sup>70</sup>。如此说来，未来经济需要为“能满足所有人需求的社会”创造条件。

提供创造平等生活机会的公共产品同欧洲的进步理念“良善社会”可以相互兼容。在亚洲情境下，“发展是一种自由”能迎合印度等自由民主政体，而采用东亚发展模式的国家可以把它同政府的引导角色联系起来。对社会和谐的强调、政府在为良善社会创造条件时扮演的积极角色这两点同东亚价值观可以相互兼容。



## 6.2 增长指南针：社会正义的、可持续的、绿色动态的增长

一些“后增长”语篇从亚洲起源（“幸福”<sup>71</sup>和“自给自足”<sup>72</sup>），在亚洲和全球得到广泛讨论。另一方面，亚洲对所有意图放缓GDP增长的做法心存疑虑。印度和中国一次又一次拒绝加入全球气候治理体制，顾虑之一就是全球气候治理体制背后有没有什么破坏本国经济发展的幕后动机。因此，呼吁各国减少消费以应对气候变化，或放缓出口以解决国际贸易失衡都不是现实的选项。虽然亚洲有“幸福”和“自给自足”的诉求，但“去增长”同亚洲主流思想相互不兼容。不过，EoT强调“有更高规范性目的的质的增长”（为良善社会创造条件），呼应了全面后增长语篇的疑虑。

增长指南针对EoT模型的定义至关重要。为了把EoT模型转化成政治沟通工具，增长指南针必须在它和现有模型之间搭建桥梁，形成语篇联盟。因此，我把指南针的三个轴分别命名为“社会正义的、可持续的和绿色动态的增长”，目的就是要将未来经济模型放在“语篇生态”<sup>73</sup>的中心。把它放在中心，就能同许多其他参与者结盟。

在福特主义时代，“社会正义的增长”这一领域被社会民主范式占领。新自由主义兴起后，进步语篇处于守势。近来，“社会增长”<sup>74</sup>、“体面资本主义”<sup>75</sup>和“精神层面”<sup>76</sup>等理论试图夺回语篇霸权。联合国及其下属的开发银行提倡“包容性增长”<sup>77</sup>（如“广泛基础增长，共同增长和亲贫增长”）。“社会正义的增长”同所有这些理论都可以相互兼容，而且呼应了进步运动的传统。

“可持续增长”这个维度不太好定义，因为它的构成要素同“社会正义的增长”及“绿色动态的增长”的构成要素相互交织。尽管如此，为

了形成语篇联盟，还是应当把这个专门针对金融资本主义不稳定性 and 失衡的维度单列出来。“可持续增长”让凯恩斯主义复活，又同亚洲流行的“新唯发展主义”<sup>78</sup>相互兼容。

为了更好地在亚洲宣传绿色增长，应将注意力集中在“动态增长”潜力上，而非全球气候治理谈判所强调的责任分担。亚洲参与者希望用务实的、“做一件事的同时不忘其它事”的态度来应对生态危机。他们希望采取组合拳来减缓气候变化，如排放目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 and 改变消费习惯等。与此同时，他们希望能够维持高增长率。因此，EoT语篇应当把“绿色增长”同“动态增长”机遇结合起来，而非同“可持续增长”所强调的稳定结合。“绿色动态增长”参考了“绿色新政”<sup>79</sup>和“第三次工业革命”<sup>80</sup>等绿色增长语篇。

“社会正义的、可持续的和绿色动态的增长”这三个维度放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平台，让社会民主派、劳工运动、金融资本主义批评家、开明的保守派、环保主义者和唯发展主义者能够在其上形成多元联合阵线。它的语气同印度提倡的“更快、更可持续、更包容的增长”<sup>81</sup>接近。泰国发展计划的目标是“公正的社会，高质量的增长，社会、经济和自然可持续性”<sup>82</sup>。对平衡的强调也呼应了中国的“和谐发展”理想。与此同时，EoT模型同“华盛顿共识”和激进的“去增长”<sup>83</sup>概念有着明显区别。

## 6.3 增长引擎

增长动因是任何一种叙事的中心。它们衔接技术政策制定和规范性目标。增长引擎解释究竟是什么驱动经济增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外行和专才都寄希望于增长引擎。增长动因还在很大程度上预先确定是什么让那些引擎转动起来。

“所有人享受公平收入和对所有人才的包容



## 驱动社会正义的增长”

**EoT**强调把人力资本视为生产率和创新的主要源泉，其目的是反驳新自由主义把劳动力和公共产品看作削弱竞争力的成本来源的诽谤。新提出的对“包容性制度”<sup>84</sup>的强调，将“包容性制度”当成增长关键动议之一，就是把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重新界定为提高劳动力资质和劳动生产率的手段。对劳动生产率的聚焦把雇主对竞争力的关注和劳动者对素质提高的需求结合在一起。

我们可以用以下迷你叙事来开宗明义：

“提供教育、医疗保健和社保使所有人都有条件去充分探索自己的才能。包容性制度强化了所有人的能力，因此驱动着社会正义的增长。”

收入增加带来消费增长这一概念把对外部脆弱性的关注同收入平等这一社会问题衔接起来。

“收入平等刺激大部分人的消费支出。收入驱动的消费需求弥合了贫富之间的社会鸿沟，从而推动了社会正义的增长。”

**“金融、社会和自然环境的稳定以及贸易和预算平衡驱动可持续增长。”**

对“稳定的金融市场”的强调把**EoT**语篇同一大批金融资本主义的批判者联系起来。这些批判者从后马克思主义左翼（进攻，占领！）、劳工运动、新凯恩斯主义者到正统自由主义者和批判“过度”的保守人士（基督教民主人士），应有尽有。在1997/98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亚洲主流一直对无监管的金融市场和资本自由流动持有戒心。

“金融行业监管和新布雷顿森林机制将会打击短期投机，鼓励对生产率和创新进行长期投资。稳定的金融市场降低繁荣和衰退周期的风

险，支持可持续增长。”

对贸易平衡的需求在对全球化持怀疑态度的左翼（进攻，占领！）和南方国家（世界社会论坛、聚焦南方国家）的“公平准入”倡导者之间搭起了桥梁。

在欧洲和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成为争议最大、政治意味最强的议题之一。在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警惕转化成了对“民粹主义支出”的强烈批评和对长期“财政厄运和经济崩溃”的警告。另一方面，进步人士对紧缩政策带来的破坏性经济和社会影响恼火万分，把财政可持续性视为精英削减社会开支的借口。因此，我们显然需要重新掌控对财政可持续性下定义的霸权。在**EoT**模型里，财政可持续性和平衡预算的目的是稳定和宏观经济均衡，不是财政鹰派挟持政策制定过程的借口。

联合国亚太经社委员会一改过去对总预算赤字和公共债务等名义目标的重视，转而强调公共开支的质量和构成<sup>85</sup>。

**“旨在恢复国际和国内平衡的宏观经济政策为可持续增长提供必要的稳定性。”**

对环境和社会稳定的需求显然同社会主义的增长和绿色动力增长这两个维度相互重叠。不过，强调稳定环境的稳定功能还是很重要的。

“一个稳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和平为可持续增长提供必要的稳定性。”

**“原有经济的绿色转型和绿色创新驱动绿色动态增长”**

绿色技术投资激发创新这一思想在“绿色新政”，“第三次工业革命”<sup>86</sup>和“生态产业政策”等概念里得到阐述。值得亚洲注意的是怎样避免



工业化国家犯过的错误，直接“跳跃”到资源效率高的生产、移动和住房模式中去<sup>87</sup>。为了突出绿色创新机遇，**EoT**强调绿色增长的“动态”潜力：

“绿色技术投资打开了机会之窗，创造了新市场和绿色工作岗位。绿色创新驱动动态增长。”

不过，**EoT**语篇不能仅仅聚焦于绿色增长带来的机遇，还必须提倡所有行业的动态发展。亚洲新兴经济体面临的主要挑战还是“沿价值链上移”，以便逃脱“中等收入陷阱”。强调政府的指导作用完全符合亚洲的发展阶段，也同“北京共识”相互兼容。在欧洲，政府的指导角色历来是社会民主模型的传统要素。在美国，经历30年“大政府还是小政府”之争后，涌现了一股提倡“聪明政府”的潮流，要求政府在市场失灵时介入。

“智慧政府在市场失灵的地方提供指导。为了设定通向动态增长的路径，政府需要建立激励结构，鼓励对生产率提升和创新进行投资。”

政府设定路径的目的既是为了造就绿色创新，也是为了提升绿色生产率。讲究资源效率把对能源成本、能源安全和碳排放带来的环境影响的关注联系起来。把生产、移动和住房同有限资源的使用“脱钩”的主张已经转化为“原有经济的绿色转型”。<sup>88</sup>

“原有经济的绿色转型意味着将我们的生产、生活和出行方式同有限资源的使用脱钩。”

## VII 展望：动员社会变革力量

在下一个阶段，未来经济项目将继续完善**EoT**发展模型。为了找到应对更广泛的生态、社会和政治挑战的方法，为了给“良善社会”打好基础，下一阶段的讨论应当吸引经济历史学家、政治科学家、环境和气候变化专家以及哲学家的参与。最重要的是，国家层面的工作组必须对模型做出本地化修改，为解决各自社会的独特挑战量身定制政策组合。同时，替代叙事的写作也将开始。**EoT**语篇矩阵是走向新语篇的第一步。技术行话应当转换成厨房餐桌上使用的朴实语言。因此，**EoT**模型必须超越经济学家社区，明确邀请沟通专家的参与。

未来经济模型不只是一个政策指南针或语篇矩阵。它也是一个搭建广泛社会联合阵线的平台，让各方求同存异。把各种力量集聚打破多元联合阵线中来，是转变发展路径的政治斗争取胜的关键。换句话说：实施社会正义的、可持续的、绿色动态政策的几率取决于多元联合阵线能否动员政治力量、影响决策者的政治意图。**EoT**项目的目标是联合政党、行政当局、工商界、实施机构、雇主联合会、工会、非政府组织、大学、智库、专业协会、央行、发展规划者和媒体的力量，创建多元联合阵线。

全球经济的中心向亚洲迁移，亚洲语篇新霸权将毫无疑问地影响到西方的语篇。一个共同的亚欧进步叙事将会影响到世界各地人民对政府、社会和市场之间关系的思考和讨论。未来经济项目不但要寻找应对当下挑战的方法，还要为争取未来经济的政治斗争做好语篇准备。



Marc Saxer

How to Produce Socially Just, Sustainable and  
Green Dynamic Growth for a Good Society

## 支持

订阅者们并不一定完全赞同本文的所有命题。他们以私人身份支持本文的理论方法和主要政策建议。



---

## 订阅者

### **A. Prasetyantoko**

Atma Jaya University, 印度尼西亚

### **Apichat Satitniramai**

Thammasat University, 泰国

### **Atul Sood**

尼赫鲁大学, 印度

### **Chantana Banpasirichote Wungaeo**

朱拉隆功大学, 泰国

### **Daniel Lind**

Unionen首席经济学家, 瑞典

### **Hansjörg Herr**

Hochschule für Wirtschaft und Recht, 德国

### **Hogyun Kim**

Myunggi University, 韩国

### **Klaus Busch**

奥斯纳布吕克大学, 德国

### **Klaus Jacob**

柏林自由大学, 德国

### **Le Dang Doanh**

高级经济师, 河内, 越南

### **Gatot Arya Putra**

印度尼西亚研究和战略分析

### **Masayuki Otaki**

东京大学, 日本

### **Moneer Alam**

经济增长研究所, 印度

### **Nguyen Tue Ah**

经济管理中央研究所, 越南

### **Pasuk Phongpaichit**

政治经济学荣休教授, 朱拉隆功大学, 泰国

### **Pokpong Junvith**

Thammasat University, 泰国

### **Ram Gopal Agarwala**

经济学家, 印度

### **Sebastian Dullien**

Hochschule für Technik und Wirtschaft Berlin, 德国

### **Somkiat Tangkitvanich**

泰国发展研究院

### **Tae-Hee Hong**

Chosun University, 韩国

### **Thitinan Pongsudhirak**

安全和国际研究所, 泰国

### **Wenfeng Wei**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 中国

### **Xingmin Yin**

复旦大学, 中国

如果您想支持未来经济平台, 请访问我们的

Face-book 页面

([www.facebook.com/TheEconomyOfTomorrow](http://www.facebook.com/TheEconomyOfTomorrow)),

并且订阅。请点“赞”, 以便获悉未来活动, 并同

未来经济社区的其他成员辩论。





---

## 文献和脚注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的未来经济系列可通过  
<http://www.fes-asia.org/pages/shaping-the-economy-of-tomorrow-in-a-sustainable-way/publications.php> 访问

<sup>1</sup> An earlier version of this chapter has been published in various blogs, see <http://marcsaxer.blogspot.com/>

<sup>2</sup> Klaus Busch, Is the Euro Failing? Structural Problems and Policy Failures Bringing Europe to the Brink, FES Study, April 2012.

<sup>3</sup> Henning Meyer, Analysing the Eurozone Predicament

- Not One Crisis but Three, in ZBW
- Leibniz Information Centre for Economics, Intereconomics 2012-5, p. 272ff.

<sup>4</sup> George Soros, How to save the EU from the euro crisis. There is now a real danger that the euro crisis may end up destroying the European Union, Project Syndicate, The Guardian, 9.4.2013, <http://www.guardian.co.uk/business/2013/apr/09/george-soros-save-eu-from-euro-crisis-speech> accessed 29.4.2013

<sup>5</sup> David Graeber, 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 New York 2011.

<sup>6</sup> Ulrich Beck, A German Europe, Polity 2013.

<sup>7</sup> David Priestland, Merchant, Soldier, Sage, A New History of Power, Penguin 2012.

<sup>8</sup> Susan Strange, Casino Capitalism, 1986.

---

<sup>9</sup> Blätter für deutsche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 Das Ende des Kasino-Kapitalismus. Globalisierung und Krise., Berlin 2009.

<sup>10</sup> Nouriel Roubini, Stephen Mihm, p. 62.

<sup>11</sup> Nouriel Roubini, Stephen Mihm, p. 82ff. , Stiglitz Report, 2010.

<sup>12</sup> Nouriel Roubini, Stephen Mihm, Crisis Economics. A crash course in the future of finance. New York 2010, p.62ff.

<sup>13</sup> Michael Dauderstädt , "Germany' s socio-economic model and the Euro crisis" , Brazi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33, n° 1, January-March (2013) 3-16.

<sup>14</sup> Michael Dauderstädt, "Germany's Economy - Domestic Laggard and Export Miracle" , FES Asia Economy of Tomorrow series, November 2012; Daniel Lind / Christian Kellermann, "The Swedish Economy - Structural Fragility beneath Strong Macroeconomic Performance" , Economy of Tomorrow November 2012.

<sup>15</sup> Charles Goodhart, Gerhard Illing, Financial Crises, contagion, and the lender of last resort/ a read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Joseph Stiglitz and members of a UN Commission of Financial experts, The Stiglitz Report, New York 2010, Preface xi.

<sup>16</sup> Nouriel Roubini, Stephen Mihm, Crisis Economics. A crash course in the future of finance, New York, 2010.

<sup>17</sup> Stefan Collignon, "The Moral Economy and the Future of European Capitalism/ Mastering



---

the Crisis” , CER Rapport on Europe, (2009).

<sup>18</sup> Philip G. Cerny, Paradoxes of the Competition State: The Dynamics of Political Globalization, in: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ume 32, Issue 2, pages 251 – 274, April 1997, first published online: 22 MAR 2007.

<sup>19</sup> Sanford J. Grossmann/ Joseph Stiglitz, On the Impossibility of Informationally Effective Markets, 70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93, 405 (1980); Joseph Stiglitz, “The Anatomy of a Murder: Who killed America’ s economy?” , Critical Review 21 no 2-3 (2009): 329-39; Stiglitz Report, 2010, p. 14, 21; Geoffrey M. Hodgson et al, Letter to Her Majesty the Queen, 10 August 2009, <http://www.feedcharity.org/user/image/queen2009b.pdf> accessed 22.4.2013; David Colander et al,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Systemic failure of Academic Economics (Dahlem Report” ), Kiel Institute for World Economy Working Paper No. 1489, Feb 2009; Stefan Collignon, “The Moral Economy and the Future of European Capitalism/ Mastering the Crisis” , CER Rapport on Europe, (2009).

<sup>20</sup> Richard A. Posner, The Crisis of Capitalist Democrac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Chapters 8 and 10.

<sup>21</sup> Daron Acemoglu, James Robinson: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2012.

<sup>22</sup> UN Escap Economic and Social Survey of Asia and the Pacific, Bangkok, 2013.

<sup>23</sup> Richard Wilkinson, Kate Pickett, The Spirit Level, Why Greater Equality makes societies stronger,

New York 2009.

<sup>24</sup> Henning Meyer, *ibid*, 2012, p. 276.

<sup>25</sup> Marc Saxer, Democracy 3.0: Zeit für ein Systemupdate!, Blog, first published 22.5.2012, <http://sagwas.net/democracy-3-0-zeit-fur-ein-systemupdate/>.

<sup>26</sup> Frank Schirrmacher, Ego. Das Spiel des Lebens, Karl Blessing Verlag, München 2013.

<sup>27</sup> Wilkinson/ Pickett, *ibid*, 2009.

<sup>28</sup> Joshua Kurlantzick, Why the ‘China Model’ Isn’t Going Away. From Bangkok to Caracas, Beijing’s style of authoritarian capitalism is gaining influence, The Atlantic.21.3.2013, <http://www.theatlantic.com/china/archive/2013/03/why-the-china-model-isnt-going-away/274237>

<sup>29</sup> Ramgopal Agarwala and Le Dang Doanh, “Booms, Bubbles and Busts,” 4th Economy of Tomorrow Regional Forum, Bangkok Thailand, February 2013.

<sup>30</sup> Ramgopal Agarwala, “Socially Just, Sustainable and Dynamic Growth for a Good Society - A Case Study for India” FES Asia Economy of Tomorrow series (EoT), January 2012.

<sup>31</sup> William Pesek, The BRICS Expose the West’ s Hypocrisy, Bloomberg, 29. 3. 2013.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3-03-28/the-brics-expose-the-west-s-hypocrisy.html> accessed 31.3.2013.

<sup>32</sup> Stiglitz Report, Preface xviii.



---

<sup>33</sup> Stiglitz Report, p. 7f.

<sup>34</sup> Nomura economists Zhiwei Zhang/ Wendy Chan cited in Nithi Kaveevivitchai. Cracks appear in China, Bangkok Post 1.4.2013. <http://www.bangkokpost.com/business/news/343371/cracks-appear-in-china> .

<sup>35</sup> Compare here: Piotr Stolarczyk and Aleksander Laszek “Socially Just, Sustainable and Dynamic Growth for a Good Society - A Case Study for Poland” , Economy of Tomorrow, November 2012.

<sup>36</sup> Pham Lan Huong, “Booms, Bubbles and Busts,” , and Atul Sood on the case of Gujarat (India), . 4th Economy of Tomorrow Regional Forum, Bangkok Thailand, February 2013.

<sup>37</sup> Pasuk Phongpaichit, Pornthep Benyaapikul, “Locked in the Middle-Income Trap: Thailand’s economy between resilience and future challenges” , FES Asia Economy of Tomorrow series (EoT), March 2012; Lee Jeong-Woo, Kim Ky-Won, Kim Ho-Gyun and Cho Young-Tak, “Socially Just, Sustainable and Dynamic Growth for a Good Society - A Case Study for Korea” , Economy of Tomorrow, November 2012.

<sup>38</sup> Janti Gunawan and Dr. Kym Fraser, “Green Jobs in Indonesia - Potentials and Prospects for National Strategy” , Economy of Tomorrow, March 2012; Chaiyasit Anuchitworawong, Prinyarat Laengcharoen and Kannika Thampanishvong, “Green Growth and Green Jobs in Thail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Potentials, Perspectives,” Economy of Tomorrow June 2012; Kim, Hyun-woo, Han, Jae-Kak; Park, Jun-hee, “Green Growth and Green Jobs in Korea

---

- Potentials and Perspectives” , Economy of Tomorrow, June 2012.; Nguyen chi Quoc Doi Moi – “An Outlook on the Potential of Green Jobs in Vietnam” , Economy of Tomorrow, November 2012.

<sup>39</sup> Wu Libo “Green Jobs in China - Comparative Analysis, Potentials & Prospects” , FES Asia Economy of Tomorrow series, December 2012.

<sup>40</sup> Sebastien Dullien, Hansjorg Herr, Christian Kellermann, Decent Capitalism: A Blueprint for Reforming our Economies, Pluto Press 2007.

<sup>41</sup> Nouriel Roubini, Stephen Mihm, Crisis Economics. A crash course in the future of finance. New York 2010.

<sup>42</sup> Nicholas Stern, Amar Bhattacharya, Mattia Romani, Joseph E. Stiglitz, A New World’ s New Development Bank, Project Syndicate, 1.5.2013,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the-benefits-of-the-brics-development-bank> accessed 3.5.2013.

<sup>43</sup> Joseph Stiglitz, The Stiglitz Report, 2010, p.11.

<sup>44</sup> Michael Spence, 2012, p. 189.

<sup>45</sup> Thomas Herndon/ Michael Ash/ Robert Pollin, Does High Public Debt Consistently Stifle Economic Growth? A Critique of Reinhart and Rogoff, Amherst, 15.4.2013. [http://www.peri.umass.edu/fileadmin/pdf/working\\_papers/working\\_papers\\_301-350/WP322.pdf](http://www.peri.umass.edu/fileadmin/pdf/working_papers/working_papers_301-350/WP322.pdf) accessed 2.5.2013.

<sup>46</sup> Lee Jeong-Woo, Kim Ky-Won, Kim Ho-Gyun and Cho Young-Tak, “Socially Just, Sustainable and



---

Dynamic Growth for a Good Society - A Case Study for Korea", FES Asia Economy of Tomorrow series, November 2012.

<sup>47</sup> Stiglitz Report, p. 200.

<sup>48</sup> Michael Spence, *The Next Convergence. The Future of economic growth in a multispeed world*, Picador 2011/2012, p. 58, 74.

<sup>49</sup> Richard Wilkinson, Kate Pickett, *The Spirit Level, Why Greater Equality makes societies stronger*, New York 2009.

<sup>50</sup>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London 1936.

<sup>51</sup> A. Prasetyantoko, "Booms, Bubbles and Busts," 4th Economy of Tomorrow Regional Forum, Bangkok Thailand, February 2013. Michael Spence, 2012, p. 74, 159.

<sup>52</sup> Michael Spence, *The Next Convergence. The Future of economic growth in a multispeed world*, Picador 2011/2012, p. 155.

<sup>53</sup> Stiglitz Report, p. 196.

<sup>54</sup> see Stiglitz Report, 2010, p.57 ff.

<sup>55</sup> Michael Spence, 2012, p. 141.

<sup>56</sup> Alfred Pfaller / Philipp Fink, *An industrial policy for social democracy : cornerstones of an agenda for Germany*, FES Perspektive 2011; Alfred Pfaller / Philipp Fink, *Save jobs or drive structural change forward? Ten theses on industrial policy in the economic crisis*, FES London, 2009; Jörg Meyer-Stamer, *Moderne Industriepolitik oder postmod-*

---

*erne Industriepolitiken?*, FES 2009.

<sup>57</sup> Machnig, Matthias, *Ecological industrial policy as a key element of a sustainable economy in Europe*, FES Perspektive, December 2011; Mikfeld, Benjamin, *Ecological industrial policy : a strategic approach for social democracy in Germany*, International Policy Analysis, October 2011.

<sup>58</sup> Jeremy Rifkin, *The Third Industrial Revolution. How lateral power is transforming energy, the economy and the world*. Palgrave 2011; Martin Jänicke, Klaus Jacob, "A Third Industrial Revolution? Solutions to the crisis of resource-intensive growth," FFU-report 02-2009.

<sup>59</sup> Michael Spence, 2012, p. 188f.

<sup>60</sup> Stiglitz Report, p. 22.

<sup>61</sup> Michael Spence, 2012, p. 151 Michael Spence, 2012, p. 141.

<sup>62</sup> Ramgopal Agarwala at the 4th Asia Europe EoT Forum in Bangkok, 25.-26.2.2013; Zhou Xiaochuan, "Reform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23.3.2009, <http://www.bis.org/review/r090402c.pdf>; Jörn Griesse & Christian Kellermann, "What comes after the dollar?" International Policy Analysis, April 2008, <http://library.fes.de/pdf-files/id/ipa/05257.pdf>; Jin Zhongxia,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ramework. Dollar dominance here to stay. British pound seen as one of four smaller reserve currencies with renminbi and euro. "In the OMFIF (Offici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Forum) commentary, 7.2.2013, Vol.4 Ed.6.4 [tinyurl.com/Jin-Zhongxia](http://tinyurl.com/Jin-Zhongxia). All URL accessed



---

20.3.2013.

<sup>63</sup> Stiglitz Report, p. 196.

<sup>64</sup> Marc Saxer, *Multilateralism in Crisis? Global Governan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 Thomas Renard and Sven Biscop, *The European Union and Emerging Powers: How Europe Can Shape a New Global Order*, Ashgate, May 2012; Stern/ Amar / Romani /Stiglitz, *ibid.*

<sup>65</sup> Alfred Pfaller / Philipp Fink, *An industrial policy for social democracy*, 2011; Alfred Pfaller / Philipp Fink, *ibid.*, 2009; Jörg Meyer-Stamer, *ibid.* 2009.

<sup>66</sup> Sethaput Suthwart-Narueput, "Public Investment: Identify a mix of policy guidelines which could lead to more balance or unbalanced growth" 4th Economy of Tomorrow Regional Forum, Bangkok Thailand, February 2013; Michael Spence, p. 74f.

<sup>67</sup> Machnig, *ibid.*, 2011; Mikfeld, *ibid.*, 2011.

<sup>68</sup> Plato, *The Republic* (385 B.C.).

<sup>69</sup>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2.

<sup>70</sup> Amartya Sen, *Development as Freedo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sup>71</sup> Bruno S. Frey, Alois Stutzer. „What can economists learn from happiness research?“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0(2) (2002):402-435.

<sup>72</sup> Medhi Krongkaew "The Philosophy of Sufficiency Economy" , *Kyoto Review Feature*, October 2003.

---

<sup>73</sup> Benjamin Mikfeld, "Transformation, Hegemonie und Diskurs, Aktuelle Denkmuster über Krise, Wirtschaft Wachstum und Gesellschaft" , *SPW* 4/2012; the map on p. 21 builds on Hubert Schillinger' s mapping on development discourses, 2011.

<sup>74</sup> Michael Dauderstädt, "Social Growth, Model of a progressive economic policy, *International Policy Analysis*" , FES, January 2012.

<sup>75</sup> Dullien/ Herr/ Kellermann, *ibid.*, 2007.

<sup>76</sup> Richard Wilkinson, Kate Pickett, *The Spirit Level, Why Greater Equality makes societies stronger*, New York 2009.

<sup>77</sup> UNDP, The International Policy Centre for Inclusive Growth (IPC-IG), <http://www.ipc-undp.org/pages/newsite/menu/inclusive/whatisinclusivegrowth.jsp?active=1> accessed 2.5.2013.

<sup>78</sup> São Paulo School of Economics of Getulio Vargas Foundation Structuralist Development Macroeconomics Center, *Ten Theses on New Developmentalism*, 29.9.2010 <http://www.tenthesesonnewdevelopmentalism.org/> accessed 4.4.2013;

Luiz Carlos Bresser-Pereira, *From old to new developmentalism in Latin America*, FGC EESP Textos para Discussão 193, June 2009; Shahrukh Rafi Khan, Jens Christiansen (editors), *Towards New Developmentalism Market as Means rather than Master*, Routledge 2.9.2010.

<sup>79</sup> The Green New Deal, retrieved from <http://www.greennewdealgroup.org> accessed on 22.03.2013.



---

<sup>80</sup> Rifkin, *ibid*, 2011; Jänicke/ Jacob, *ibid.*, 2009.

<sup>81</sup> As specified by India's 12th Five Year Plan, cited in Mini Govindan and Jaya Bhanot, "Green Jobs in India - Potentials and Perspectives", FES Asia Economy of Tomorrow series, December 2012.

<sup>82</sup>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oard, Office of the Prime Minister, The Eleventh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Plan 2012 (2012-2016), Bangkok, 2011.

<sup>83</sup> Institut d'études économiques et sociales pour la décroissance soutenable (2003) <http://decroissance.org/>, Nicholas Georgescu-Roegen, From bioeconomics to Degrowth: Georgescu-Roegen's new economics' in eight essays, April 2011; Serge Latouche, Degrowth economics: why less should be much more, *Le Monde Diplomatique*, November 2004.

<sup>84</sup> Daron Acemoglu, James Robinson: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2012.

<sup>85</sup> Noeleen Heyzer, *Macroeconomics needs improving*, Bangkok Post 22. 4. 2013, <http://www.bangkokpost.com/opinion/opinion/346375/macroeconomics-needs-improving>.

<sup>86</sup> Jeremy Rifkin, *The Third Industrial Revolution. How lateral power is transforming energy, the economy and the world*, Palgrave 2011.

<sup>87</sup> Martin Jänicke, Klaus Jacob, "A Third Industrial Revolution? Solutions to the crisis of resource-intensive growth," FFU-report 02-2009.

---

<sup>88</sup> Martin Jänicke, Klaus Jacob, *ibid*.





---

## About the author

**Marc Saxer** is the Resident Director of Friedrich-Ebert-Stiftung Thailand and coordinator of the Asian-European 'Economy of Tomorrow' project.

---

### **Friedrich-Ebert-Stiftung Thailand Office**

Thanapoom Tower, 23rd Floor  
1550 New Petchburi Road,  
Makkasan Ratchathewi,  
Bangkok 10400  
Thailand

Responsible

Marc Saxer, Resident Director

Tel: + 66 (0) 2652 7178

Fax: + 66 (0) 2652 7180

E-mail: [info@fes-thailand.org](mailto:info@fes-thailand.org)

[www.fes-thailand.org](http://www.fes-thailand.org)

Find this paper online under

[http://www.fes.de/cgi-  
bin/gbv.cgi?id=10000&ty=pdf](http://www.fes.de/cgi-bin/gbv.cgi?id=10000&ty=pdf)

Commercial use of all media published by the Friedrich-Ebert-Stiftung (FES) is not permitted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the FES.

The views expressed in this publication are not necessary those of the Friedrich-Ebert-Stiftung.